

隋文帝传

韩昇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张维训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文帝传/韩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

(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ISBN 7-01-002816-8

I. 隋…

II. 韩…

III. 杨坚(541—604)-传记

IV. K827.41

隋文帝传

SUI WENDI ZHUAN

韩 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875

字数:408千字 印数:1—10,100册

ISBN 7-01-002816-8/K·580 定价:32.00元



隋文帝图像

(唐阎立本作《古帝王图卷》，原件绢本设色，
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隋文帝

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
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
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
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

隋文帝書《慧則法師帖》

（宋《淳化閣帖》）

目 录

第一章 艰难时世	1
第一节 “五胡乱华”	1
第二节 断裂的社会	7
第三节 道德沦落与离心意识	15
第二章 家世疑云	28
第一节 “那罗延”的诞生	28
第二节 弘农杨氏	34
第三节 武川英豪	37
第三章 多事之秋	48
第一节 初入仕途	48
第二节 “两姑之间难为妇”	51
第三节 崭露头角	63
第四节 危险的国丈	69
第四章 政变建隋	76
第一节 变起萧墙	76
第二节 控制京师	82
第三节 平定三方	92
第四节 禅 让	106
第五章 除旧布新	117
第一节 启运开皇	117
第二节 确立三省六部制	121
第三节 制定律令礼制	128

第四节	构建大兴新都	143
第五节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	149
第六章	御侮安邦	162
第一节	塞上风云	162
第二节	冲破包围	168
第三节	战略转折	175
第四节	构建中的世界性帝国	186
第七章	开皇之治	204
第一节	勤劳思政	204
第二节	孝治天下	211
第三节	继续均田	219
第四节	整治乡村	227
第五节	强化财经制度	236
第六节	增进国力	246
第八章	君臣之间	256
第一节	用人政策	256
第二节	组建新的领导核心	270
第三节	穿越潜流暗礁	278
第四节	扬清激浊	289
第五节	监察防范	298
第九章	统一大业	310
第一节	平陈谋略	310
第二节	直下金陵	320
第三节	再平江南	335
第四节	迈向世界	346
第十章	偃武修文	356
第一节	寓兵于民	356
第二节	崇文兴教	359
第三节	铨选改制	369

第四节 功成修乐	376
第十一章 太平志逸	389
第一节 仁寿宫	389
第二节 醉心宗教	397
第三节 文化统制	412
第四节 政情异动	418
第十二章 家族纷争	435
第一节 独孤皇后	435
第二节 废黜二王	442
第三节 改立太子	449
第十三章 苍凉晚景	468
第一节 企盼“仁寿”	468
第二节 大鹏折翼	477
第三节 凄楚病逝	485
 隋文帝年表	 495
引用地名一览表	510
主要引用论著目录	523
 余 言	 534

附 表

表一 隋室系图	36
表二 杨坚杀戮北周宗室一览表	112
表三 隋文帝时代州郡废立表	153
表四 隋朝县废立表	158
表五 隋《开皇令》所规定京官职田表	222
表六 魏晋隋唐水利设施建设统计表	251

表七	文帝时代三省长官表	259
	(1)尚书省左、右仆射表	259
	(2)门下省纳言表	260
	(3)内史省监、令表	260
表八	文帝时代六部长官表	262
	(1)吏部尚书表	262
	(2)礼部尚书表	263
	(3)兵部尚书表	263
	(4)刑部尚书表	264
	(5)民部尚书表	264
	(6)工部尚书表	265
表九	文帝时代禁军卫府大将军表	265
表十	平陈后南方复起基本情况表	339
表十一	隋唐两代学官品级对照表	414

第一章 艰难时世

第一节 “五胡乱华”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歔歔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

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①。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派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在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②。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杀红了眼,杀昏了头,仇恨蒙蔽了双目,分不清是非

① 时间记载依《资治通鉴》卷九十,“晋元帝建武元年(317)”条,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敌友，只晓得种族异同。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

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①。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②，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③。

在这场祸乱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数族统治者。他们藉“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少数族原受奴役，文化水平不高，军事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掠夺来激励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在进入中原之后，还必须极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力，把国家政权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后赵末年，石虎（字季龙）的残暴统治天怒人怨，为了转嫁政治危机，他再次祭起种族仇恨的幽灵。

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

① 《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四、五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晋书》卷五十六，《孙楚附孙绰传》。

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①。

自西晋主力被击溃之后，中原地区已无法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抵抗，以农耕为业的汉人挡不住少数族骑兵的暴风骤雨。永嘉乱后，汉人受尽欺凌虐待，而“汉”字也多为骂语，如汉狗、痴汉、恶汉、汉子、一钱汉、卑劣汉、无赖汉等等^②，流毒甚远，乃至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亦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贱视汉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显著的特点。

随着少数族政权的巩固，汉民族也伴随着恢复生产、重建社会的进程而复苏伸张。继续歧视汉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并将危及少数族政权自身的安定。有远见的政治家切身感受到吸收汉族文化、重整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于是，北魏孝文帝断然采取全面汉化的政策，以求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中实现政权的脱胎换骨，变军事国家为政治国家，以适应农业化社会的需要。

然而，百余年民族压迫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成见，却在这脆弱激进的改革中激化。虽然汉化已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存在与发展、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但在缺乏文化传统的胡族权贵眼里，看到的只是昔日为人贱视的汉人纷纷登上政坛，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危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民族矛盾的沉渣泛起，并以“六镇暴动”的形式猛烈迸发出来。边镇鲜卑将士再次用铁铸的利剑、鲜血写就的语言，作最后的挣扎，力图把中原社会再度拖入民族对抗的深渊。乘时继起的高欢集团就是以六镇鲜卑为骨干，利

① 《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

② 桑原鹭藏著、黄约瑟译《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收于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用民族矛盾而兆基霸业的。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①

此所谓“胡汉分治”的实质,是鲜卑族对汉族的奴役欺凌,视汉人犹如草菅,明显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反动。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刘)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②。

在少数族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社会以崇武为时尚,贵戚子弟“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③,是非准则屈从于武勇实力,伦理道德在政治权力的蹂躏下呻吟,日益凋落的汉族文化为专擅杀伐的塞北胡风所笼罩。鲜卑语不但成为华北的通行语言,而且还成为判定个人政治忠诚的标志。北齐的孙搴学浅行薄,却因为能说鲜卑语而大受齐高祖高欢重用,宣旨传令,颇掌机要。权臣祖珽有才无行,平日与一帮纨绔子弟渔猎声色。齐高祖宴请臣僚,他旧习难改,顺手就把席上金器藏入帽中,当场被捉住。后来又诈盗官粟三千石,锒铛入狱,可是因为他精通鲜卑语而获释,依然故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鲜卑语的流行,直接推动塞外文化习俗向中原地区的浸淫弥漫。戎乐胡舞、羌笛琵琶、握槊走马,盛行于世,尤得权贵耽爱。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史丑多、沈过儿、王长通之流,因能歌善舞而封王开府;和士开一手琵琶绝技,竟登相位。西域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九月”条。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九月”条。

③ 《隋书》卷五十,《李礼成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深目高鼻的胡人小儿，虽文墨不通，亦以音乐至大官，甚至连波斯狗也得封仪同郡君，享受俸禄。皇宫之内，白天走马驱驰，夜来胡音哀曲，阉宦胡儿，齐声唱和。曲终歌罢，涕泣痛哭，此起彼伏。

接受胡俗，刻意模仿学习，就表明对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归依，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北齐有位士大夫不无得意地向人密授当官诀窍：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①。

民族歧视的政治高压，使得胡俗不断渗透于汉人社会。祖珽与京城少年歌舞为娱，樗蒲为戏。更有甚者，一些汉人学会南腔北调的胡语，因游戏见宠，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昌黎（今辽宁义县）人韩凤在北齐当权，便以残害汉族士人为能事，制造冤案，于朝中厉声痛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②毫无愧色。相反，学习儒家汉学就会被视作异己，招致不测。北齐废帝高殷，勤奋好学，温文尔雅，其父文宣帝便觉得他颇似汉人，屡欲废之。有一次，文宣帝登金凤台，强令他手刃囚徒，他不忍下手，竟遭文宣帝鞭挞，直吓得当场神经错乱。

胡化的结果导致了社会的粗鄙化和政治的野蛮化。当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之后，国家以军事为主导的外向扩张就日益转变为以提高君权为导向的内部体制建设，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统制。这时，草原马背上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不能适用于农业社会，部落酋长联盟式的寡头民主制不能适应于提高君权的需要。于是，恢复以忠孝尊卑为核心的等级礼制再度成为紧迫的课题。“六镇暴动”虽然暂时迟

① 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教子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北齐书》卷五十，《恩幸·韩凤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滞了这一进程,但却无法完全阻挡它。所以,汉化并不是一个种族优劣、文化高下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经过长期少数民族统治和胡化浸染的中原社会,汉化不可能也不会是简单的复古倒退,回复汉晋文化制度,它必然包含着扬弃旧文化与吸收新文化要素两个方面。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要解决民族与文化的融合问题,而且是要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心理,重新整合分裂的社会,成为最深刻与稳定的文化内核,达到深层的强有力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远比军事占领和领土统一更加艰巨复杂。历次汉化运动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民族冲突,但究其实质却是鲜卑族社会进步而带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激化。那么,对于积极推进汉化运动以求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社会呢?

第二节 断裂的社会

西晋政权崩溃之后,中国北方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诱使边疆各族蜂拥而入,抢夺瓜分这片富庶沃土。最初是匈奴,而后,羯、鲜卑、氐和羌族接踵而至,纷纷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政权。这些互不统属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原有的羁绊被冲决了,掳掠战利品(财物、人口和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他们谁也无法取得公认的正统地位。神圣的权威被打碎之后,实力代表了一切,胜利就是真理。这样,战争作为衡量是非的最高语言,不停地轰鸣。西晋灭亡后的弹指一挥间,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遽兴旋灭。

阵阵的狂飙,如雨的铁蹄,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惊涛骇浪之中,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

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①,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

早期的坞壁是为避乱而组建的,所以大都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②等坞名所示,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这样,在国家地方行政组织之外,游离出大量不受管辖的村落组织^③。

国家政令不行,则坞壁势必要自行制定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晋书》卷八十八《孝友·庾袞传》记载:

〔庾袞〕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星罗棋布于战乱地带的坞壁脱离于国家政权之外,自定法规,

①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② 以上见《水经注》卷十五,《洛水·伊水·瀍水·涧水》。

③ 从动乱时代的坞壁屯聚发展出和平时代的自然村落,是魏晋隋唐时代社会基层组织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收于夏日新、韩昇、黄正建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宫崎市定《中国古代史论》(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堀敏一《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村》(收于《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版),均有深入的探讨。拙著《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章也对坞壁的组织结构及其在东亚国家的影响进行分析,请参阅。

各行其是，犹如一盘散沙。“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而胡族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这一点，是我们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出发点。诚然，大一统局面的崩溃，冲决了思想的禁锢，带来了个性的解放和艺术创造精神的昂扬，然而，这一切乃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内心的痛苦所铸就的。

林林总总的坞壁，差别甚大。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①，从几百户到数千家，坞壁的规模，相去甚远。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其基本形态却是共通的，这就是宗族构成了坞壁集团的核心，而其推举产生的坞主或行主一般都是乡里豪帅^②。当然，他们中间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他们的权力并不来源于官场经历，而在于其通过宗族对党乡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世家族罹难遁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

战乱时代崛起的坞壁及其豪帅，构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然与以往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实际上可以得到确证者为数不多。因此，他们并不是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不能毫无甄别地混为一谈。

上层为争夺政权的殊死搏斗，造成社会的失控。在基层，形形

① 见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宸翰楼影本，1913年。

② 坞壁首领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多由坞壁内部推举产生，例如：1. 坞主，《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记载：“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蒙阳，后移新郑。”2. 行主，《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记载：“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